



国家边海防研究中心学术著作

WIND FROM THE SEA: A RESEARCH ON CHINA'S MODERN SEA IDEA

海风吹来： 中国近代海洋观念研究

侯昂好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海风吹来：中国近代 海洋观念研究

侯昂好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风吹来：中国近代海洋观念研究/侯昂好著。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4. 11
ISBN 978 - 7 - 80237 - 728 - 8
I. ①海… II. ①侯… III. ①制海权 - 关系 - 国防建设 - 研究 - 中国 - 近代 IV. ①E815②E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47345 号

书 名：海风吹来：中国近代海洋观念研究

作 者：侯昂好

责任编辑：常巧章

封面设计：倪春昊

出版发行：军事科学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 100091）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80237 - 728 - 8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9.75

字 数：128 千字

版 次：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3000 册

定 价：20.00 元

销售热线：(010) 62882626 66768547 (兼传)

网 址：<http://www.jskxcb.com>

电子邮箱：jskxcb@163.com

出版说明

二〇一四年四月，国家边海防研究中心成立。“中心”是国家边海防研究工作的协调管理机构，是边海防战略决策的咨询机关，是边海防理论创新的学术基地。为了加强边海防实践和理论问题研究，特推出“国家边海防研究中心学术著作”，出版“中心”研究员、特聘研究员的研究成果，也可收编经“中心”评审认可的其他专家的学术研究成果。

国家边海防研究中心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



前 言	(1)
1 民族主义与海洋观念	(7)
1.1 近代民族国家：19世纪末期中国海洋观念的 空间重构	(8)
1.2 从魏源到梁启超：民族主义与海洋观念的 自觉与合一	(13)
2 观念就是力量：观念与行动互助为长	(20)
2.1 闭关锁国与被动应对：矮化为海防的 海洋观念	(22)
2.2 观念与行动同进退：国防破碎中的海洋观念	(29)
2.3 移植观念的困境	(39)
3 海洋观念主体：政治、思想、军事的多重合奏	(55)
3.1 政治家的海洋观念：思想、计划与行动	(56)
3.2 地理学家的海洋观念：在地理与政治之间	(59)
3.3 留日学生群体：海权观念的启蒙与传播	(73)
4 启导国民、海在东方：《东方杂志》中的海洋观念	(79)
4.1 日俄战争与海权观念（1904～1906）	(80)
4.2 从军事到商业（1904～1906）	(86)
5 “中国的太平洋”：《海军杂志》研究	(90)
5.1 海军和《海军杂志》：海洋观念的先行与启蒙	(91)

5.2	“中国的太平洋”：从大陆国家到海洋国家	(93)
6	甲午恶浪：观念差异与综合博弈	(96)
6.1	日本的海洋观念预示中日海上战略碰撞	(96)
6.2	胜负快慢之间——对甲午战争的另一种观察	(99)
7	历史的穿越与回归：近代中国海洋观念的启示	(114)
7.1	多学科视野：中国走向海洋的思维模式转换	(114)
7.2	从地理到地缘：中国走向海洋的新机遇与 新挑战	(121)
7.3	发展利益驱动：中国走向海洋的强大 内生动力	(131)
7.4	民族主义情感：中国走向海洋的激情与理性	(138)
	参考文献	(143)

前　言

万岁海洋！万岁波涛，
你们为圣火所环抱！
水啊万岁！火啊万岁！
万岁这稀世的际会！
万岁微拂的和风！
万岁不可思议的坑洞！
让这里一切受到庆祝，
你们就是四大元素！^①

观念（idea）是什么？为什么选择观念作为研究近代海洋的视角？“观念”一词最早源于希腊的“观看”和“理解”，在西方15世纪就用该词表达事物和价值的理想类型（idea type），也指人对事物形态外观之认识；17世纪后涉及构思过程。^②“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③其实，只要驱除西方柏拉图主义（Platonism）和德国观念论（German Idealism）给它蒙上的神秘外衣，“观念”并不难定义。简单说来，观念是指人用某一个（或几个）关键词所表达的思想。人们通过它们来表达某种意义，进行思考、会话和写作文本，并与他人沟通，使其

① [德]歌德：《浮士德》，绿原译，第2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 参见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第167页，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3年版。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3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社会化，形成公认的普遍意义，并建立复杂的言说和思想体系。一旦观念实现社会化，就可以和社会行动联系起来。^①因此，观念与思想相比，首先，因为观念是用固定的关键词表达的思想，它比思想更确定，可以更具明确的价值方向。其次，因为观念比思想具有更明确的价值（行动）方向，它和社会行动的关系往往比思想更直接。^②“观念不会被视作不过是飘浮在空气之中，与社会实在脱离开来。”^③观念有更明确的价值方向，与社会行动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因此，历史就沉淀在观念中。“观念史研究是走向精神解放之必要的一步。”^④审思近代中国海洋观念的意义也就在于此。

1486年，狄亚士绕航好望角；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的巴哈马群岛；1493年，教廷发布敕令将世界一分为二，东边是葡萄牙的势力范围，西边是西班牙的势力范围。正在此时，1492年，明朝命令沿海人民不得与来华的番船交通；1493年，明朝敕谕，今后百姓的商货下海即以“私通外国”治罪。地缘政治学家索尔·科恩指出：“地球的两个主要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是海洋与大陆。这些环境为不同特点的地缘政治结构的形成提供了舞台。在这两个环境中演绎生成的文明、文化以及政治制度，就其在经济、人文传统、精神和地缘政治面貌等方面而言，是完全不同的两类。”^⑤生存的环境、状态和方式渐渐凝聚升华为与环境相应的品格力量、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大陆与海洋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下锻造的思维观念也

① 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第3页，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②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第3页，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③ 玛丽娅·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第21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④ J. M. 凯恩斯的观点，转引自〔英〕以赛亚·伯林、〔英〕亨利·哈代：《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王崇兴、张蓉译，第1页，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

⑤ [美]索尔·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严春松译，第33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

是迥然有异的。大陆安定、封闭的环境中，勤恳守成的品质是生存的根本，而在充满风险、流动不居的茫茫大海上，只有敢于冒险、不守成规才有生存的权利。长期信守的观念已经上升为信念甚至信仰，成为文化基因和民族性格。在海洋与大陆两种环境中衍生的文化基因、民族性格、制度理念和国家方向有着天壤之别。伯里克利告诉雅典人，“在你的面前，这世界可以分为两个领域——大陆与海洋，均可为人类所涉足，而你，就是这海洋的主宰”。雅典人是与海洋厮混在一起的，将其未来押在对海洋统治权的不断追索上。希腊历史学家为这种权力专门创造了一个名称——“制海权”。有史以来，在从黎巴嫩海岸向西直到直布罗陀这片封闭的海域内，各支舰队不断地发生冲突。直到近代，西方的大航海时代燃起的海洋热情达到了高峰：“由于我们航海家的勇敢，大洋被横渡了，新岛屿被发现了，印度的一些僻远隐蔽的地方揭露出来了。西方大洲，即所谓新世界，为我们祖先所不知的，现已大部明了了。”^① 正如马汉（Alfred T. Mahan）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一书中所写：“环境促使地中海比其他任何同等面积的水域在世界历史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无论从商业或是军事角度来看皆是如此。各个民族都试图控制它，这种竞争现在仍在进行。”^② 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厚爱，中国有了海洋和大陆两个舞台，但却几乎长期在大陆上演出跌宕起伏的历史剧，将力量与智慧都凝结于此，而将另一个舞台——海洋淡忘、荒废，直到近代在海上遭遇入侵的悲剧。中国在地理上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国家，心理上却是一个农耕文明的大陆国家，临海却背向海，近海却不倚仗海，这种独特的地理与文化的分裂长久以来影响着中国的发展方向。“中国缘海外围没有足以由海上威胁中国的力量，如迦太基之

① [英] 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伍况甫等译，第230页，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英] 约翰·R. 黑尔：《海上霸主——雅典海军的壮丽史诗及民主的诞生》，史晓洁译，绪论，第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于罗马，故近世以前中国的海是安全的外缘地带，对中国只有保护性，没有侵略性，因此海在中国是不折不扣的‘水沙漠’”^①。“从周秦到隋唐，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地带在黄土高原，以农为本奠定了华夏民族的主体地位，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盛世伟业，同时也养成依恋黄土地的社会心理和思维偏向。即使宋代以来因时局的变动和经济重心南移，国家向外用力的方向倾斜海洋，开辟出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发动过郑和七下西洋的远航，也被视为一时权宜之计，而非根本性的选择。”^②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历史岁月中，国家的发展指向和社会心理在大陆而不是海洋。明末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被后世誉为“千古绝作”“海内奇书”，被张之洞作为兵书收录到《书目答问》中，梁启超称之为“最典型的军事地理学著作”。应当说，《读史方舆纪要》达到了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学的最高峰。理所当然，顾祖禹在该书中的海洋观念也应当最具有历史代表性，也最能反映当时知识分子海洋认知的高度。“海道南自琼崖，北达辽碣，回环二万余里。鱼盐之饶，下被于民；輶输之利，上济于国；而挞伐之方，戍守之备，所系亦綦重矣……其要荒蕃服及岛屿诸夷，皆略而不书者，亦以见重内略外之意，且不欲启后世穷兵黩武之心也。”^③这段话足以表明古代的学者对海洋是有理性认知的，既认识到了海洋的交通运输价值，又看到了海洋带来的巨大利益。但最后一句体现了民族的文化心态：重内略外，不起穷兵黩武之心。这说明中国对海洋的地理实用价值是肯定的，而在文化价值和道德评判上又是否定的。重内略外，对岛屿诸夷都略而不书，就是面向大陆，背向海洋，因此，有意识地压抑海洋方面的知识和智能成为本能选择。整个《读史方舆纪要》对海洋、海

① 李东华：《中国海洋发展关键时地个案研究》，第2页，大安出版社1990年版。

② 杨国桢：《瀛海方程：中国海洋发展理论和历史文化》，自序，第1页，海洋出版社2008年版。

③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第11册，贺次君、施和金点校，第5491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外语焉不详，采取一种附记或者概述的方式一带而过。代表中国古代最高军事地理水平的学者没有全球的概念，没有完整的海洋意识，甚至没有周边海洋认知，对学者来说是一种遗憾，对国家民族来说就是一种悲哀了。

到了近代，北部的边疆危机转为东部的海疆危机，维系中国几千年的大陆文化开始受到冲击，海洋观念应御侮求强而生，体现了中国思想观念由大陆向海洋、由农业向商业、由传统向现代、由守成向进取的转变。“文明的位置远非偶然的事情。如果它是一个挑战的话，那么它是一个反复的长时段的挑战……任何文明的基础是它与命运中创造的或不得不再创造的环境之间的生命攸关的无限重复的联系。”^① 这是文化与地理的关系，也可看成中国近代海洋观念在地理位置与文化性格之间的选择、对创造与再创造的深刻阐释，中国海洋观念是在近代百年的短小时段中对几千年漫长文化沉淀作出的抉择。马汉认为影响国家“海权”产生的基本要素有六个：地理位置；一定的国土面积和一定的人口数量；海岸线的长度和港口的特点；从事与海洋或各种舰船有关的行业；民族特点；政府充分发挥作用。^② 前三点属于客观条件，后三点则属于主观意志。中国海区地理位置的优势在于它是连接各方的交通枢纽。中国东南面向太平洋，南抵太平洋与印度洋结合部，既是东北亚与东南亚之间的主要海上通道，也是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纽带，海区内有许多重要的国际海上通道及其咽喉要道，这是中国海上地理因素战略价值最大的一部分。而制约的因素则在于：单向面海，只濒临太平洋；岛链阻隔，沿岸地区水浅潮大；等等。与地中海的风平浪静不同的是，中国人一开始向海洋拓展的时候就面临汹涌澎湃的太平洋，世界第一洋无疑比地中海要难征服多了，因此中国在成长的幼年时期

^①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第2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 参见〔美〕艾·塞·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00～1783》，安常容、成忠勤译，第5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

就对海洋产生了恐惧感和挫折感。总体来说，中国海洋观念的突破就在于后三点也就是主观意志的推进和努力。“人所受到的他的社会联系之网的束缚与他受到的空间束缚一样大，因而在我看来，任何将人类事件归并到地理学方面的做法都至少要在两方面进行：既归并到空间也归并到社会秩序。”^① 中国的历史说明，较为充足的客观条件如果没有相应的国家战略、文化心理和民族激情配合，那么茫茫大海就归于沉寂，失却活力，漫长的海岸线也就不再是梦想出发的地方，而是遭遇攻击的方向。中国海洋观念的滞后和缺失既要归并到空间也应归并到社会秩序。考察近代中国的海洋观念，可以通过海洋观念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更加清晰中国的方向。

^①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第1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 民族主义与海洋观念

民族主义与领土观念紧密相连，无法分离。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民族主义与海洋观念几乎同时在遭受西方入侵中萌发，这既是19世纪中国世界秩序与空间观念重构的体现，又是中国在日益激烈的世界竞争中民族主义的彰显。民族主义与海洋观念都是典型的西方近现代观念，在西方国家由中世纪走到近代化、由欧洲到全球的过程中起到了直接推手的作用，功不可没。民族主义与海洋观念在中国近代走过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朦胧到清晰的历程，这是感受、学习、融合另一种文明的历程，由此中国也开始了由传统王朝向民族国家、农业向工业、大陆向海洋的艰难转向。从魏源到梁启超开启了将民族主义与海洋观念合一的思考。这种结合使得民族主义和海洋观念的视野更具有世界性和前瞻性。当然，这种新的观念对于后进式、大陆性、农耕文明的国家而言，要经历启蒙、启蒙再启蒙，传播、传播再传播的漫长路程，这个路程直到今天也没有走完。

胡安·诺格对于民族主义与领土的关系有着精辟的论述：“各种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领土意识形态形式（forma territorial de ideología），或者直接叫领土意识形态（ideología territorial）。我认为，民族主义维护的民族，不仅被‘位置’在空间里，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这也是所有社会组织的共同特征），而且民族主义还与其他社会现象不同，它明确要求特定的领土，这块领土是民族认同的组成部分，是其强调所谓特殊性、例外性和历史性的根据……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领土’（territorio nacional）

观念，是一切民族主义的根基。”^① “民族主义是一种深深扎根在领土、地方和空间中的社会和政治运动。民族主义运动除了进行领土操作外，还诠释和适应空间、地方和时间；由此，民族主义运动相互交替地创造着一种地理和历史。”^② 从民族主义和领土的关系可以看到地理观念与民族主义相依相存的关系。由于“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地理战略”^③，所以它天然和领土相连，难以分离。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和海洋观念在面对海上入侵时几乎同时萌发，相生相长。

1.1 近代民族国家：19世纪末期中国海洋观念的空间重构

民族主义与地理观念具有不可分离的天然关系，“今天和过去一样，民族‘观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进行地理打造的结果。拉科斯特说：‘不管愿不愿意，地理理由不仅在政治（或政治家的主张）中占有重要分量，而且在民众对祖国观念的表述中也占有重要分量……’”^④ 民族主义与地理观念的天然关系在近代中国还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情感。民族主义是理性与情感的结合体，从本原上讲偏重情感，当然近代民族主义是因时代理性而区别于传统民族情感的，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西方相比，因救亡图存之主旨而更偏重情感，主要体现在不重个人自由平等而强调国家利益。海洋观念首先是一种认知，一种知识和理性。但由于中国近代在海上遭遇入侵，因此海洋观念也在地理、经济、军事的理性认知中加入了强烈

① [西班牙] 胡安·诺格：《民族主义与领土》，徐鹤林、朱伦译，第22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② [西班牙] 胡安·诺格：《民族主义与领土》，徐鹤林、朱伦译，第16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③ [西班牙] 胡安·诺格：《民族主义与领土》，徐鹤林、朱伦译，第23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④ [西班牙] 胡安·诺格：《民族主义与领土》，徐鹤林、朱伦译，第89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的民族情感。由知之而忧之，由忧之而爱之，正因如此，它与民族主义产生了共鸣，甚至部分交融。

首先，我们看看中国古代的海洋观念。“人类群体为了获得自己的人格，为了建成一个利益和感情共同体，必须在一块领土上定居下来。移民、侵略和战争给每个群体确定了一块特定的领土。这块地方是他的第一笔物质财富，是他发展的基地，是他的历史的家园。领土或者地理位置，对人类群体的影响不可置疑。”^① 按照地质板块构造学说，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位于欧亚板块东部和太平洋板块西部相交会的沿海陆地上。在数十万年的历史长河中，自然界几经沧海桑田，中华民族负陆面海的大地理环境始终没有改变。虽然从远古到清末，海洋行动断断续续进行着，在宋明时期还一度呈现了海洋贸易交流的繁荣，但是，在文化上中华民族却始终是面向大陆背向海洋。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在海上获得渔盐之利的齐国，却在文化心理上完全臣服于儒家农耕文化，其他诸侯国无论地理、经济状况如何，在政治文化上也几乎都是如此。从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到苏轼的“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都将海洋归于蛮荒与神秘。“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洲各国所没有的，就算他们有更多壮丽的政治建筑，就算他们自己也是以海为界——像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② 海洋是自然赋予人类的最广阔、最便捷的“公路”，也是文明国家竞相活动的乐园。然而，以前的国人一向视海洋为畏途，望之而却步，“望洋兴叹”一句成语，足以道破国人对海洋的屈服。即便好大喜功如秦始皇、唐太宗、元世祖者，虽也曾想向海外发展，但一经阻难随即作罢。其他平庸懦弱的统治者，更不用说了，他们只要“四海臣

^① [西班牙] 胡安·诺格：《民族主义与领土》，徐鹤林、朱伦译，第 68 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② [德]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第 93 页，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

服、普天同庆”，做一个四海之内的小皇帝便足够了。中国人说“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但却不会说“海外有海”，只会说“四海之内”。对于中国人来说，海之外的想象力和向往感是缺失的。“大陆环境以极端气候和远离公海为特征。这样的环境经常因为山脉、沙漠、高原障碍的影响，或纯因距离太远等原因，而遭受与外部世界缺乏密切联系之苦。历史上，它们的经济较之海洋地区更加富有自给自足的性质，而它们的政治制度，因接触不到新影响、新观念，往往逐渐变成封闭和独裁。”^① 海洋的利益、文化与强大的农耕文明并不协调，与农耕文化相辅相成的是内部的运河发展。“一个朝代若能有力量维持并保护这条运河，则其货物运输量会远远超过一切海道运输。这是由于中国社会欢迎在运河上用人力拖拽的船运，而不喜欢海上贸易的离心趋势。而且运河所经过的都是开垦地区，它的组织可以与农村行政相协调。海运却是一件独立的事，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竞争行为。”^② 海洋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从属于陆地，海洋和山川大漠一样作为中华民族的保护屏障而不是通道，海防则是屏障文化的军事投射，是被动而有限的应对。中国长期以来主要是一个陆强国家（land power），而不是海强国家（sea power），对于海洋认知的差别深深影响了国家民族发展路径。长久以来，遵从陆地文明的中国与崇尚海洋文明的西方在晚清以战争的方式在海上开始了激烈碰撞。

近代民族主义在中国的萌发是反思灾难和屈辱的结果。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19世纪后半叶中国所受的屈辱和灾难使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进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重新评价和重新组

^① [美]索尔·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严春松译，第35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

^②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第2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织。”^①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在历史上以其强大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吸引力成为东亚的中心，在近代一再遭遇蕞尔小国的入侵而承受着几乎亡国灭种的危机，痛定思痛的反思浪潮一再掀起。“巨大的灾难或许并不必然产生真正的革命，但是却准确无误地预报革命，使人们感到有必要对宇宙进行思索，更确切地说，是重新思索。”^②中国自秦汉以后，奉行“修齐治平”，重家重天下，实在是一种文化主义，而缺乏民族主义。“文化主义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优越性，而非物质财富的进步，到了近代，中国人才意识到中国文化不能对付西方人的物质进步，于是，放弃文化主义而转向民族主义。”^③到了近代，中国为了反抗西方列强的侵逼，渐渐改举民族主义大旗。民族主义的兴盛，带来前所未有的时代激情，从此力倡以中华为整体，以民族国家为单元，与西方列强抗争，以御侮求存。西方列强航海而来，日本也恃海而强，海洋成为了时代的焦点，海洋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痛点，海洋极大地触动了士大夫们的神经。在他们看来，爱海就得观海，爱国就得筹海，御侮就得防海。可以说，民族主义之兴起与近代中国人的海洋激情，是互为助力、相互渗透的。

法国大革命在19世纪初期通过战争把激进改革带到法国邻邦，使得许多欧洲君主被推翻，“民族”即成为欧洲景观里的要角。“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形成历史，是因为它能‘胜任’形成历史的任务。它生动地经历着一种内部的历史和一种外部的历史，这种内部的历史使它处于‘胜任的状态’，而只有在这种‘状态’中，它才具有创造力，而外部的历史则存在于这种创造中。所以，作为国家的各

①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下册，吴象婴、梁赤民译，第46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②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第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③ 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第18页，浙江出版社2010年版。